

历史文献的新发现和历史资料的整理

复旦大学历史系 傅德华

中国历史文献，始于甲骨文。据此它涵盖了所有书面的历史资料。它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历史文献有史书、有档案，还有其他方面的资料。史书系指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和经过编辑整理的资料。中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历史文献整理与出版。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不仅关注新发现的历史文献，且十分重视对前人传承下来的历史资料的整理、校刊与出版。并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本文所说的历史文献的新发现，系指在二十世纪第一次被披露发表及公开出版或未出版的文化典籍。同时亦包含上个世纪已出版过，二十世纪又被第一次“再版”、影印的史书以及各类奏稿、全集、丛书、丛刊等。本世纪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数量巨大，浩如烟海，涉及到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史的诸多领域。从时间上讲，如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可分为两个五十年。前五十年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1900 至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二）1912 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五十年再可分为两个阶段：（一）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二） 1979 至 2000 年改革开放后的 20 年。

一、前五十年取得的成就

1、清光绪、宣统年间（光绪二十六年—宣统三年 1900—1911）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整理出版历史文献最多的王朝。其中康熙、乾隆年间成就卓著。光绪、宣统年间远不及他们的前辈。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称“光宣之间，我中国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虚之甲骨，二曰汉晋之简牍，三曰六朝及有唐之卷轴，而内阁大库之元明及国朝之书实居其四”（注 1）。王国维在上述文字中提到的四种新史料，包括对这四种新史料的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纪或被正式出版，或已被收录在各种文集或资料汇编中。如 1899 年发现的甲骨文，1904 年孙诒让对其所研究的著作《契文举例》，以及后来发掘的 10 余万片的甲骨片上的文字经整理为 13 册《甲骨合集》（中华书局 1982.10），先后予以出版。其他三种史料亦有专门的集子得以保存下来。如《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影印 1933.3）、《明清内阁大库史料》（2 册 东北图书馆 1949）等数十种。这是光宣年间为世人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光宣两朝当时正遇上中国近代中上的三大事件：一是十九

世纪末年的 1898 年的戊戌变法，二是二十世纪初年的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三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尽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历史文献的整理方面，还是有不小的收获。

据不完全统计，光宣年间，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达数百种之多。最早的是 1900 年上海排印出版的未著编者的《戊戌变法》一书（注 2）。此书分为上谕及附录两部分。目录前有英文目录，疑为外人所编。上谕部分收录“诏定国是”、“诏疆臣洗心革面力任艰巨变法图强”等戊戌变法谕旨 29 道，附录部分除康有为第五道上清帝书外，均为当时报刊有关戊戌变法的议论。与这一专题相关的历史文献还有：《变法自强奏议汇编》（1901）、《维新奏议》（1902）、《光绪谕折汇存》（1903）以及《戊戌奏稿》（1911）等。与另两个专题有关的有《奉禁义和拳汇录》（1900）、《庚子北京事变纪略》（1901）、《庚子教案函牍》（1905）、《浙江铁路风潮》（1907），以及清朝被推翻前整理出版的 45 册线装石印本《大清法规大全》（1911）。另有各种汇编、章程、公牍、日记等，代表性有《吉林交涉汇编》（手抄本 1903）、《各省商务议员章程》（1905）、《北洋公牍类纂》（1907）、《出使九国日记》（1906）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清朝后期编辑刊发的《湖北商务报》（1899—1905）、《北洋官报》（1902）、《东方杂志》（1904—1948）、《四川学报》（1905—1911）、《政治官报》

(1907—1911)、《须弥日报》(1908)等 20 余种报刊。上述报章所刊载的文章，成了光宣年间留给世人的十分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刊、宣统三年(1911)停刊的《政治官报》，计 1370 号，台湾文海出版社收齐全书后将其与《内阁官报》合为 53 册，已于 1965 年影印出版。比它早四年创刊的《东方杂志》连续出版了 44 年后，于 1966 年在台湾复刊仍在继续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光绪年间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出版时间最久的综合性刊物。该杂志保存下来的资料倍受学术界的青睐，1949 年前停刊的那部分现已全部影印出版，为学术界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民国年间(1911—1949)

1912 年 1 月 1 日，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迄止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建立，在这 38 年期间，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达数以千计。其中最有特色的历史文献之一系各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下属专门机构发布的各类“公报”，诸如《临时政府公报》(1912)、《黑龙江公报》(1913)、《宪法会议公报》(1916)、《云南教育公报》(1921)、《外交公报》(北洋政府外交部 1921—1923)、《司法公报》(1927—1948)、《铁道公报》(1928—1937)、《盐务公报》(1927—1937)等，其种类多达 50 余种。有的如《陕西省政府公报》(1927—1949)、《福建省政府公报》(1927—1949)、《浙

江省政府公报》（1927—1949）、《贵州省政府公报》（1927—1949）等，从第一号始，迄止新中国成立前，保存完好，且都是第一次发表。这些“公报”被整理与出版，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司法等，无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笔者所知，至今尚无有人对上述“公报”作过完整的综合性的研究，有待很好地开发与利用。

民国时期，最具特色的历史文献之二，系将以往有学术价值的古籍以“丛书”形式加以纂辑出版。

丛书的编纂在我国约有 1500 年的悠久历史。民国时期，伴随着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和印刷技术的革命，丛书的出版更是蒸蒸日上。据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12）、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1982.7）和《中国丛书综录补正》（1992.6）等丛书目录的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丛书约 800 余种，占同时期出版的 6400 种总量的八分之一。清代是出版古代丛书的全盛时期，纂辑丛书的数量超过全部古代丛书的一半，区区 800 余种似乎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如果以年代平均计，清代历史 286 年，平均每年十数种，民国在短短的 38 年间，则超过 20 种。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丛书的数量相对胜过前代。不仅数量可观，且质量上乘。其代表性的有《嘉业堂丛书》，其中 50 种均为“世间不经见之书”（注 3）。商务印书馆和中

华书局采用先进技术排印和影印出版三部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 1919)、《四部备要》(中华书局 1936)和《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 1935)(注 4),其中,中华书局 1924 年以钱塘丁辅之、丁善之仿宋精刻欧体活字,创制的“聚珍仿宋活字”排印的《四部备要》,古雅生动,“当可与宋槧之刊媲美”(注 5)。还有商务印书馆采用最先进的照相影印技术印刷的大型古籍丛书百纳本《二十四史》(1937)和《通典》(1937)、《通志》(1937)、《文献通考》(1937)等鸿篇巨著(注 6)。这些巨著后来都成为中国古籍丛书出版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名垂后世。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丛书中,除重印的 100 种部分选印的古代丛书外,其余 600 余种都是新纂辑的。特别突出的是纂辑的 40 余种地方志丛书。其中《辽海丛书》填补了东北地区无地方志丛书的空白。全面网罗有关文献,收搜流传极少的书。搜残存佚之功,在地方志丛中极为引人注目。汇集一代学者著述的丛书以及各类专科丛书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代表性的有《艺风堂藏书记·续记·再续记》(1900·1912·1962)、《章氏丛书》(1919)、《励耘书屋丛刻》(1934)、《太平天国丛书》(1938)、《明清史料》(1930—1975)、《诸子集成》(1936)等,都各具特色和价值。上述提到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几乎都重印和再版。

民国时期,最具特色的历史文献之三,系整理出版了中国

共产党及在其领导下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文献。其代表性的有《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941)、《六大以后——党内秘密文件》(194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文献》(1942)、《七七抗战六周年中外文献汇编》(1942)、《政协文献》(1946)、《人民政协文献》(1949)和《统战政策汇编》(1949)以及《1948年以来政策汇编》(1949)、《南京市军管会人民政府政策法规汇编》(1949)等。这些珍贵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下来,为学术界研究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民国时期,最具特色的历史文献之四,是自 1833—1949 年,旧中国创办的数万种报刊中的历史资料。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目录》(1862—1949)和《1833—1949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的统计,旧中国保存下来的报纸有 3500 余种 期刊近 20000 种(注 7),外文报刊 130 余种(注 8),其中 1900 年以后至新中国建立前创刊的中外文报刊,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上述中外文报刊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内容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广、资料最丰富的当属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创刊,1949 年上海解放时停刊的《申报》。该报原先由英国商人美查(Erenst Major)创办。初隔日出版一张,四个月后又改为

日报。1909 年（宣统元年）为买办席裕福购进，1912 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量才接办。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反映抗日救亡要求，并出《自由谈》副刊，发表进步言论。1934 年史量才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趋向保守。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时期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受，成为 CC 系报纸。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时停刊，历时 77 年。从该报的经历，不难窥见其在旧中国政坛的影响。难怪人称，《申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为此上海书店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过搜集整理，将其全部影印出版，共四百册，使其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重新为学术界所利用。它的整理与出版实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包括中国报刊史的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

除《申报》外，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和台湾对上述确有史料价值，因时间久远、印数较少、学术界使用时难以查找的部分报刊进行整理后，分期影印出版（注 9），数量达百余种之多，有的还专门编制目录和索引（注 10），供同仁索检，受到一致好评。尽管如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已经出版可供利用查找的上述报刊目录索引太少，远远跟不上历史学发展的需求。

二、后五十年取得的成就

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由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中国学术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有计划、有系统、有重点地整理出版旧中国传承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20 年，对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加大了力度。于是后五十年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点校，取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为显著的成就。从时间上讲，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一）1949 年 10 月—1978 年 12 月，为前 30 年；（二）1979 年—2000 年，为后 20 年。

1、前 30 年取得的成就（1949.10—1978.12）

为了加强史料建设，促进中国的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即有重点对那些特别有学术史料价值的古籍和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和出版。这一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点校《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分段准确、错误较少、便于阅读的本文，国家决定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进行点校。并力求超过前人，使之成为定本的历史文献。

《资治通鉴》是建国后点校第一本大部头的历史文献。本书为北宋司马光撰。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文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 600 万字。它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书名“资治”，目的在于供封建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

借鉴。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贯串一千三百六十年的历史。该书向为学术界所推崇，作者在搜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方面都下了极大工夫，使这部书成为祖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典籍。1954 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吴晗接受毛泽东主席亲自交给点校《资治通鉴》任务后，即约请范文澜、黎澍、刘大年等 11 名著名专家对此书进行点校。并为此成立了专门“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主持此项工作。为确保点校质量，另由其中四人组成校阅小组，并于卷末列具标点、复校姓名，以示负责。此次点校的底本是依据清朝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为注本，并参考了前人校勘过的宋、元、明各本。通过校勘、搜集遗文、改正错简、增补缺文，付排后又由顾颉刚、聂崇歧等四人，分别根据统一的规定，包括标点、分段，以及正文的人名、地名、书名等标点法，校阅了全书校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 1956 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后附有《通鉴释文辨误》12 卷，以备参阅。迄止 1995 年该书已由中华书局重印了第 9 版。加上 1997 年的《资治通鉴》（缩印本 全二册），共计出版 10 个版次。该书出版 40 多年来，经过不断修订，无论在校勘还是标点方面，都已臻完善。使之成为建国后最具影响的历史文献整理成就之一。

建国后，整理出版最具影响的历史文献成就之二，是对《二十四史》的点校。这是比点校前书《资治通鉴》规模更大的一次历史文献整理工作。

清乾隆时，《明史》定稿，招刊廿二史，又诏增《旧唐史》，并以《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居正《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流行的《二十四史》有两种，一为武英殿本，即清代官刻本。清末以来各种翻刻本大体以此为根据。二为前面提到的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集合各史较早刻本影印，原书刻误多据殿本修改，但亦有改误之处。1958年，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由中华书局出面，吴晗、顾颉刚主持，对合计3000余卷4千余万言的《二十四史》进行点校。过去亦有学者选择一部或几部书加以句读和批校，如1935年国学整理社就曾组织过对《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进行“圈句”，并由世界书局正式出版发行。但从未对整套书用统一的体例来分段、标点，并进行全面的校勘。为了做好建国后第二大历史文献整理工程，国家先后组织了20多所高校及科研单位，动员几百位史学专业工作者全面整理《二十四史》，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曾一度中断，但不久又在断断续续地整理与出版，直到1978年终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成为继南宋《十七史》、明监本《二十一史》、汲古阁本《十七史》、清“殿本”、“局本”，以及近

代百衲本之后最好的本子。在以后的 20 多年中,《二十四史》多次被重印,其中司马迁撰的《史记》,多达 16 版次。除此之外,还出版过《二十四史》(缩印本)和《二十四史》(简体横排本)。前者为 20 册(中华书局 1997);后者共 63 册(中华书局 2000)。《二十四史》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的典籍中“再版”最多的历史文献之一。

《二十四史》点校本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校勘底本选择精当,多经专家遍检现存版本之后,认真比较研究后确定的。或采用旧刻本,或选择精校本,或参合众本,择善而从,为点校质量提供可靠保证。二是校勘不但荟萃诸本之长,且作了“本校”和“他校”。发现问题力求进行考证,并尽量吸收前人成果,作出颇有参考价值的“校记”,点校质量远远超过流传的各种本子。三是为便于阅读和利用,各部史书均编有人名、地名索引,以提高文献的使用价值。四是中华书局另组织出版一套《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书》,收录有关考订史实、补志、补表一类资料书,以补充新本《二十四史》之缺。本书的整理出版,堪称中华文史上的壮举,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第二,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949 年 7 月 1 日,在京的史学工作者组织了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推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为负责人。在他的领

导下，学会确立了以推动近代史研究为工作的重点，并立即展开组织整理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的工作，以贯彻毛泽东早在 1942 年于《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的重要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注 11）。次年成立总编辑委员会，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 11 位著名学者组成，并确定了各个专题和负责各专辑编辑工作的学者。当年正逢义和团运动 50 周年，首先由翦伯赞主编并出版了《义和团》4 册（神州国光社 1951.3）。1951 年 7 月中国史学会在京正式成立，主要工作之一即为继续出版《丛刊》。在此后的 10 年中，继第一种《义和团》出版之后，又相继出版了《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 1952.12）、《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 1953.9）、《鸦片战争》（1954）、《中法战争》（新知识出版社 1955.9）、《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 1956.10）、《辛亥革命》和《捻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7），《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4）。在中国史学会的精心组织下，10 年之中编辑出版了《丛书》10 种，共 62 册，3000 余万字。规模如此巨大，令人赞叹不已。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近代史资料的一次大规模的科

学整理，其涵盖了近代史各个重要时期，加上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及时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7）和九十年代由来新夏主编完成的《北洋军阀》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8—1993.4），以及后来作为1982—1990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续编》《中法战争》3册（中华书局 1996.3）、《中日战争》12册（中华书局 1989.3—1996.10）和《清末教案》4册（中华书局 1996.6）等新发现的历史资料，而组成了这一套近代史研究全面、系统的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人称这一浩大工程的完成是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方面整理出版的最有成就的历史资料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李一氓先生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会上曾讲到这部大型历史文献，光在美国利用这部文献进行研究就出了100多位博士。在中国国内，它是研究近代史的最基本的资料，利用者更甚。近年又为上海书店重新影印出版。这说明这套《丛刊》具有相当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经久不衰。它与台湾1966年沈云龙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6—1998）一至三编，每编100册，作为互补。这两套《丛刊》所搜集的近代名人奏疏、政书、年谱、笔记、日记、诗文集及经世文编、碑传集等资料，其中“尤多海

内外孤本（注 12），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继点校和整理出版上述历史文献之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于 1958 年成立了以齐燕铭为组长的古籍规划小组，确定了中华书局为整理出版古籍和有关古代、近代哲学、历史、文学研究著作专业出版机构。从此，国家开始有规划、有系统、有重点地整理出版古籍。在这一阶段整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古籍有：（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8 册（中华书局 1957）、《唐宋史料笔记丛刊》21 种（中华书局 1979—1989）、《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6 种（1983—1985）、《晚明史料丛书》和《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 1959）、《清代史料笔记丛刊》39 种（中华书局 1959—1998）、《民国史料笔记丛刊》25 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2000）、（唐）刘知几撰《史通通释》2 册（上海古籍出版 1978）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近代部分 中华书局 1962—1965）等。这一大批古籍和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为这一阶段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统计，后五十年的第一阶段共整理出版的古籍和历史文献计 1736 种，占了后五十年出版的 5000 余种图书的近三分之一。历史类的古籍和文献资料约 500 余种。以年计约数十种之多。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的。

2 后二十年取得的成就（1979—2000）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以其以前“左”的错误，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而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在古籍整理出版的主导地位，并为新时期全面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出版氛围，也为以后的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自 1979 年至 2000 年，我国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取得更加令人鼓舞的成就。这一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整理出版“三亲”史料

1959 年根据时任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们纷纷行动，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和几十年来所积累的知识、经验、见闻掌故，写出来或口述让别人整理，以传给后代。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仅几个月，就收到史料稿件“逾二百万字”，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注 13）。从此，以《文史资料选辑》为书名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陆续出版，并一发不可收拾。从 1959 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印的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始，至 1990 年，已出版了“2300 种，1300 多辑（期），约收文三十余万篇，总字数近二亿”（注 14），若加上 1991 至 2000 年已

公开出版的全国各个县，甚至各个市、区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其种类、期数及字数之多可想而知。此书原作为“内部发行”，为适应新的形势和广大读者的需要，自 1985 年第 1 辑（总第 101 辑）改为公开发行。

文史资料大都是当事人、知情人就历史人物、组织、事件回忆写成，具有纪实的特点。它不同于第一手资料，也不同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它对于第一手资料而言，可以补史之缺、匡史之谬；对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言，又可以详史之略、续史之遗。这些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资料，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宝库，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对于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所以历来受到包括专业研究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以及海内外学者的欢迎和青睐。它和台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口述历史丛书》（1—54 辑）（注 15）一样，同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第二，整理出版民国档案资料

前三十年由于受“左”的影响，中华民国史未能得到很好地研究，其相关的档案资料亦未能充分地开发与整理。1959 年，为给中央有关部门和少数高校提供部分民国档案，以资参考，由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王可风主持编辑了一套档案文件汇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因限于当时历史